

巴蜀書社

●李朝正

徐敦忠●

彭端淑詩文選

李朝正 徐敦忠

彭端淑詩文注

巴蜀書社

一九九四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8 號

責任編輯：陳大利

封面設計：李文金

彭端淑詩文注

李朝正 徐敦忠著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 
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

(成都鹽道街三號)  
成都東方福利彩印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19.25 插頁 字數 400 千

1995 年 4 月第一版

199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500 冊

ISBN7-80523-590-2/I·233

定價：24.00 元(精裝)

# 前言

然而，中國歷史上，一盤世一由表裏不面，土地兼稅日趨熾烈，貴族官紳專制無與，吏治腐敗，豪富性

文治先由基層士，懷群圖治，建師弘隆，新制益皆密恐內暗的異口丈量，對各衣面賦稅中央集權的  
中，帝王時如亞歷當即是說大由起一由冬另起國家。代其長孫劉帝，由其時父東照時父賤聚五兩時  
樂樂的風面一東照，棄五，葬劉三帝，許印韓離，大謝國難，僅就題辭。五州門益益的一百三十冬平  
味如如策，因而特對面舒不調難大，農業主重益清益對動主向幾思，手工業味越市商品益齊由呈思出  
彭端淑（一六九九——一七七九），字儀壹，號樂齋，清眉州丹稜（今四川丹稜縣）人。世為丹稜  
望族。祖父彭萬崑，號玉吾，清順治簡州（今四川簡陽市）判官，以勇著軍功授都督僉事，堅辭不就。  
封奉直大夫、懷遠將軍。父彭珣，字東璧，號三溪先生。年三十遂絕意進取，游滇、黔及吳、越、齊、  
魯、趙間數年。文章古樸，不諧於俗，曾潛心注《易》，以教諸子。同懷七人，端淑為仲，長兄端洪，  
弟肇洙、遵泗、端洋、大澤、端澈。端淑幼而穎異，十歲能文。年十二，入縣學。青年時，偕兄端洪、  
弟肇洙、遵泗讀書紫雲寺（在丹稜萃龍山）。雍正十一年（一七三三）與弟肇洙同榜進士，授吏部主事。  
數年後，弟遵泗亦登進士。弟兄三人，以科名、文名聞於世，故京師有「三彭」之目。乾隆十年（一  
七四五）擢吏部員外郎。次年，進階文選司郎中。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充順天鄉試  
同考官，拔解元紀昀。乾隆十四年（一七四九）奔母喪。十六年（一七五一）服闕，返京師，仍任文  
選司郎中。十九年（一七五四），擢廣東肇羅道觀察使，以吏治明敏，敬慎無私，名聞廣東。二十四年

(一七五九)，受總督命赴廣西救災。及回，船行海隅，夜出望海，誤墮海中，人無知者。久之，家人始覺，奮力營救，始得免。因嘆曰：「人於宦途不滿意輒以咎人，此誰擠之者？今不葬魚腹，天於我厚矣，復何望焉！」遂決計告歸。二十六年（一七六一），辭官回籍。四川學政博卿額聘掌錦江書院，出其門者如李調元、李鼎元、張鶚、姜錫嘏、鍾文韞、龍煜岷等，皆蜀中才碩。四十四年（一七七九），彭端淑以病卒於成都，終年八十一歲。（山）。

彭端淑一生經歷清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。康、雍、乾三期是清王朝所謂「文治武功」之鼎盛時期。康熙前期，清除鰲拜集團，平定「三藩」之亂，統一臺灣，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。康熙後期及雍正、乾隆時期，又平定準噶爾叛亂，統一天山南北，護送達賴六世入藏，加強對青海、西藏的管轄，奠定了國家的疆域。為了改變經濟遭到嚴重破壞、社會凋敝、極目荒涼、百姓流離失所的情況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逐漸廢止圈地，獎勵墾荒，蠲免賦稅，治理黃河，興修水利，採取一些對漢族地主階級有利的政策，因而耕種面積不斷擴大，農業生產逐漸從恢復走向發展，手工業和城市商品經濟也呈現出繁榮的局面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帝，精明幹練，大權獨攬，勤於政務。在他們統治的一百三十多年中，清王朝成為亞洲當時最強大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。尤其是乾隆帝，在其祖父康熙和父親雍正兩朝文治武功的基礎上，勵精圖治，整頓紀綱，清除統治階級內部的異己力量，從各方面加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，促成了全國範圍內城鄉經濟的增長。

然而，在所謂「盛世」的表象下面，土地兼併日趨激烈，貴族官僚揮霍無度，吏治昏庸，豪富封

殖，加以天災人禍，不少地區人民啼饑號寒，民族矛盾、社會矛盾亦相當嚴重。為鞏固其統治，清朝統治者一方面採取懷柔分化政策，用「滿漢一體」的口號收拾人心，提倡尊孔讀經，羅致名士，編纂圖書，竭力宣傳忠君思想和三綱五常等封建道德，引導知識分子追求功名利祿。另一方面，則繼續施以高壓手段，嚴厲鎮壓任何反滿思想和行動，打擊朝廷及地方朋黨，嚴懲官吏，大興文字獄，通過查禁、銷毀、刪削等方式，消滅反清文獻，借以鉗制人的思想，轉移鬥爭視線。在這種封建專制的獨裁統治下，中國知識分子綴文命筆，動輒得咎，因而脫離實際，逃避現實，埋首故紙堆中，沉湎於繁瑣考據，思想界與學術界呈現一派萬馬齊瘠的局面。清代李祖陶在《與楊蓉諸明府書》中說：「今人之文，一涉筆唯恐觸礙於天下國家……人情望風覘景，畏避太甚。見鱗而以為蛇，遇鼠而以為虎，消剛正之氣，長柔媚之風，此於世道人心，實有關係。」魯迅先生在《賈（小說大全）記》中說：「清朝的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個，尤其是後兩個皇帝，對於『文化政策』或者說得較大一點的『文化統制』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。……文字獄祇是由此而來的一種。那成果，由滿州這方面言，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有效的。」

彭端淑生活在這樣特殊的社會環境與時代條件下，他的生活道路也跟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，是一條由科舉到仕途的道路。在其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中，他「以清慎自矢」（《四川通志·彭端淑傳》），「崇實黜浮」（彭端淑《遁庵王公傳》），「外若渾淪，內實精核」（《錦里新編·彭端淑傳》）。他做官，清廉謹慎，誠信篤實，表面上寡言少語，骨子裏精於算計，暗藏機鋒。因而，任吏部主事期間，

即受史侍郎倚重，許多工作皆委其辦理，任順天鄉試同考官，同事十八房咸斂首推服，在廣東清理積案，總督楊應琚嘉贊其能，引為上座，欲首薦。小吉甫詩：「內實辭辭」（《義里稿》）。

最一愛民盡職，是彭端淑的一貫思想。他在《陽江舟中》一詩中寫道：「念彼民間訟，積案動成邱。孰非吾赤子？哀哉何所投……曰余本不佞，目擊心良憂。詎敢憚煩劇，一一剖其由。決獄無大小，得情方始休。」在《寄仲尹》一詩中，詩人又寫道：「余謬膺簡命，觀察嶺海邊。安民在察吏，負性異鷹鷂。勤勤修厥職，夙夜凜冰淵。」他任廣東肇羅道觀察使期間，出巡各地，不講排場，禁止迎送，不收賄賂，「吏民稱歌」。（《清代七百名人傳》）。在彭端淑生活的時代，如此清廉正直的風節，實為難得。

彭端淑在《江邊別舍弟仲尹》一詩中寫道：「處世存吾拙，齊家應汝癡。」與當時混濁腐朽的官場相對照，誠然詩人看起來有點「拙」，然而這正表現了詩人可貴的思想品德。張邦伸在《錦里新編》中極為生動地描寫了彭端淑的待人處世，說他「善氣迎人，絕無官狀。遇鄉老高年，必盤旋叙舊，即接後進，亦平易如常。故知與不知，咸稱盛德。」當時的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梁國治稱譽彭端淑「德器從容，涵養純粹。」（《國朝詩人徵略》、《湖海詩傳》）。

彭端淑這樣清廉正直的官吏，既不恃才傲物，目中無人，也不善於趨炎附勢，逢迎巴結，所以在黑暗醜惡的官場中很難施展自己的抱負。先是他在吏部因福建調整教諭事受到革職降一級留任處分，接着二弟彭遵泗、五弟彭端澂先後因忤大府被解官。官場的黑暗，使彭端淑深感不滿和厭惡。他無力表示反抗，而苟且偷安又於心不忍。這種矛盾惶遽的苦況，他在《秋日感懷》一詩中曾作了這樣的描

寫：「日月如跳丸，寒暑互相錯。颶風動地來，遙山雲氣薄。寒蟬抱樹鳴，凌空有鵑鶚。人生過半百，此志將焉託。本無經世才，矧不忘邱壑。」狂風大作，黑雲翻滾，鵑鶚逞橫，一個小小寒蟬又能怎麼樣呢？詩人面對專制的統治以及官場內的傾軋，感到十分消極悲觀。他在《黃河遇潮》一詩中也同樣表達了無可奈何的心情：「人生得失誰能料，對此茫茫空自嘆。」既然無力改變現實，就祇得設法脫離羈絆，以求走出塵網，尋求自適。他在詩裏反復慨嘆：「人生貴適意，胡為久羈宿」，「我生萬事盡自由，誤落塵網三十秋」，「自愧誤塵網，白首空馳驅。」顯然，堅守心志，不願同流合污，是彭端淑晚年退避官場、轉向興辦教育，以實學造士的思想動因。

彭端淑思想性格的形成和發展，固然離不開當時的社會條件，但是也與家庭的教育、訓示有直接關係。彭端淑的祖父玉吾公就是一個正直善良、不願出仕的人，對其子孫管教甚嚴，其臨終時嘗訓示子孫：「惟忠惟孝，克勤克儉，無蓄舊怨而侮鰥寡，各守厥訓，以啟後人。」（彭端淑《贈懷遠將軍玉吾公家傳》）彭端淑的外祖父王廷詔，嘗官湖南知華縣令，後也棄官歸里，掌教夾江馮江書院。彭端淑青年時期常侍外祖父，經常受到教誨：「汝祖豪傑士……汝輩當體先志，崇實黜浮，又宜力學，勿自棄。」又說：「吾生平無怨人，人亦無怨己者。」（彭端淑《遜庵王公傳》）受家庭與社會環境的影響，彭端淑的思想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歷程：早年，「壯而勤學，沈酣經術。」（《國朝耆獻類徵初編·彭端淑傳》）一心追求科舉功名；中進士以後，步入仕途，置身官場，觸目混濁，思想由清慎穩重漸趨隱忍保守。後期退出官場，隨着清王朝社會危機的加深，思想由保守落入沈鬱、苦悶、徬徨、消極，終於以



陶哉？彼能工於詩，非盡有為而作也。唐以詩賦取士，上自朝廷，下及山林草澤，莫不為詩，故詩之盛，莫盛於唐。然其所為詩者，亦不必盡出於有為，或半以供其宴飲、登臨、往來贈答之樂而已。其有詩人遺意者，吾得杜甫焉。甫之胸次近於陶，而撫時感事，愛國憂君，不得已形於詩。其自夔州以後，去君愈遠，世變愈滋，故其詩鬱然以深，幽然以渺，氣格力量有非文人才士所能到者。然是二公者，其初豈意務為如是之詩哉？志動而為情，情發而為言，是以咏歌嗟嘆，皆出於有為。雖使聖人見之，或不廢也。

文中這篇文章精闢扼要地闡明了詩歌要有所為而作這一基本論點，是彭端淑詩歌理論的宣言。所謂「有為」，其內容包括「屏迹躬耕，託意詩酒，澹逸冲融」等「至性」的抒寫、「君臣夫婦友朋間」瓜葛、眷戀的描繪，以及更為作者強調的「撫時感事，愛國憂君」之類情志的表達。當然，彭端淑的有所為而作，從其內容來看，較之白居易「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」要寬泛一些，但這種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文學主張，在當時是有着重要意義的。

雍、乾時期，沈德潛倡「格調」說，袁枚主「性靈派」。沈德潛認為「詩貴性情，亦須論法」。他所謂的「性情」，是指符合封建正統觀念所要求的思想感情，因此寫詩必須「溫柔敦厚」。所謂「論法」是要學古：古體詩宗漢魏，近體詩宗盛唐。袁枚之「性靈」說，提倡寫個人之「性情遭際」，寫個人之靈感：「但肯尋詩便有詩，靈犀一點是吾師，夕陽芳草尋常物，解用都為絕妙詞。」（《小倉山房詩文集·遣興詩》）彭端淑之「有為」說，獨樹一幟，跟「格調」說和「性靈」說都不同。若寫詩必須

「溫柔敦厚」，則如何揭露黑暗現實，同情人民疾苦？其結果必然是流於「宴飲登臨」「往來贈答」的無病呻吟，這正是彭端淑所反對的。彭端淑也主張向前人學習，如屈原、司馬遷、杜甫之作堪稱千古楷模，但他是從「有所為而作」這一角度來學的。屈原之《離騷》「探古今之變，窮草木之情，旨遠思深，搜奇抉怪，驚風雨，泣鬼神」，具有極高的藝術力量。然而它是怎樣產生的呢？彭端淑認為是「有所為而作」的結果。他在《〈離騷〉中正叙》中說：「不有屈原，豈見《離騷》！若乃精白之志，幽憤之忱，期致君於前聖，悲社稷之顛隕。黨人塞路，中正遭屯，君不見信，親亦致疑，思騁目於四荒，憶上下之求索，占靈氛，卜巫咸，遠游雖樂，故都難忘，美政無期，彭咸是蹈。悲夫傷哉！所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已。」要學習的正是屈原這種「可與日月爭光」之志。這一點，就與沈德潛「論法」的拘泥形式、模擬復古、堆砌典故有所區別了。彭端淑也主張廣泛讀書，向古人借鑒。在《多學》一文中，他說：「不通六籍史漢百代，而求工於文，譬之卻行而求前也。司馬遷博極群書，杜少陵讀破萬卷，二公之文，炳耀千古，豈不以其學哉！語云：長袖善舞，多錢善賈。非獨彼善也，錢與袖使之然也。」彭端淑主張寫詩要「流動自然，無雕琢之形，化對偶之跡」（《五言律小序》），特別稱贊李白、王維的五言絕句「其妙處全在自然而然，有不盡之味」（《五言絕小序》）。他反對雕詞琢句，追求詞藻的華麗。他說：「若夫雄詞瑰麗，馳騁可觀，不久而沒焉，正歐陽子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，鳥獸好音之過耳也，烏足以言詩哉！」（《與友人論陶杜詩書》）他稱讚貴州田端雲的詩作，說：「余讀之，若遠山橫翠，杳靄有情，又若清水芙蓉，天然去飾。襄陽、蘇州去人未遠，信乎田君之工於詩也。」（《碧山堂

詩叙》。然而彭端淑這種主張詩歌創作具有個性，樸實自然，是同有切實內容、「有所為而作」聯繫在一起的，而不像「性靈」說那樣，單純強調寫個人靈感或個人的「性情遭際」，忽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。他雖然也強調創作個性，但前提卻是創作必須「有為而作」。因此，他十分重視作家自身修養對創作的主導作用。他提出文學家應該具備「學、識、才」三種基本素養，認為作家祇有具備了這三種素養，才有可能創作出有現實內容的作品來。他在《文論》中說：「因受五經思慮而東轉西馳者，士才所以輔吾之學識以達於文者也。有學有識而才不至，則無以達其所見以行於自然之途，使天下後世厭心而悅目。」

古之詩人，未有無有為而作者。魏晉以下，專事雕繪，其所為詩不必盡出於有為。其有詩人遺意者，惟陶潛、杜甫，皆由志動而為言，是以咏歌嗟嘆，皆出於有為也。顯然，為了創作出思想性藝術性較高的作品來，作家平日必須加強自身的修養和基本功訓練；「學、識、才」對於作家來講，缺一不可，否則，「無以達其所見以行於自然之途，使天下後世厭心而悅目。」陶淵明、杜甫這樣的大詩人，當然是創作素養極為深厚的天才作家。彭端淑推崇陶杜，是因為其「咏歌嗟嘆，皆出於有為。」而要達到這樣的創作水準，則無疑須「有學、有識、有才」。由此看來，彭端淑的詩歌創作理論確實有許多超出同時人的地方，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和發掘。

彭端淑五十歲以前，全力從事古文創作（見《白鶴堂詩稿·晚年詩序》），留存至今的文章近七十篇。他推尊司馬遷、韓愈之文，凡自為文，皆宗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其古文主張，與桐城派有許多一致

之處。所不同的是，桐城派以古文正宗自命，依傍道統，以宣揚程朱理學和封建正統觀念為職志。其文學理論以《義法》為核心，強調義理、考據、辭章三者并重，講究語言的「雅潔」，并以陽剛陰柔辨析文章風格，又多提倡應用文字，而內容貧瘠，有不少陳腐的說教。彭端淑則是借用桐城派的口號，給它注進新的活的內容，力圖使文章擺脫死板、僵化、擬古、剽竊的不良風氣，代之以樸素簡潔、自然真摯的作品。他比較能接受明代「唐宋派」的文學主張，曾用了較長時間來研究歸有光（震川）的作品。他嘗說：「僕好震川之文二十餘年矣」，「震川之文，不可及者，彼於義理精微……若江河之莫禦，故其文直與『史漢』、韓、蘇及程、朱諸書相為表裏，不得以帖括名之。」（《答高工部選歸震川文書》）他在給人詩集、文集作序和平日的酬唱中，也反復強調內容真實、感情真切、抒寫個人性情的重要性。他認為：「一個作家要能寫出具有強烈現實性的作品，還必須有深厚的生活基礎，扎實的寫作功力，必須以多學充實自己，注意從名著中吸取創作養料。顯然，像他這樣把讀書與寫作、學習與借鑒之間的關係說得如此清楚明白，對今人是不無啟發的。」

三 勿庸諱言，彭端淑的政治思想和文學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。例如，因受正統思想的束縛和站在士大夫階級立場的限制，他根本無法理解李自成、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；他雖然對朝廷有所不滿，對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，但是，他仍對清王朝抱有很大幻想，甚至悔恨自己沒有為封建王朝盡到責任。他曾慨嘆：「聖恩前後予三部，臣職浮沉愧一籌」，「半身事業愧清朝」，「濟事才常拙」。此種眷戀朝廷、愧悔自慚之情，到晚年日加濃重。他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，以及幾千年封建思想的熏染，不可能完全具

備唯物主義的先進思想。他相信天命，不時流露出人的命運是由上天安排的意識，強調先天，忽視後天的自奮作用。所以，他到晚年因腳病加重，時時感傷「人生得失誰能料，對此茫茫空自嘆」，「壯心已覺隨時盡」，希求用「愁心仍寄陶潛酒，鄉緒還登杜甫臺」來安慰自己。這種消極的思想認識和憂傷的情緒，是我們閱讀彭端淑作品時應當注意的。

### 三

彭端淑在《白鶴堂詩稿·晚年詩序》一文中說：「余一生精力，盡於制義。四十為古文，五載成集。近五十始為詩，今已二十五年矣。總計前後所作，六百餘篇。」此文寫於乾隆三十六年（一七七二）作者七十三歲時。在這以後，作者還寫了不少詩作，但刊行傳世者僅三百餘首。這些詩歌，所咏并非一事，所寫并非一時，數量不少，內容豐富，是中國文學史上筆寶貴的財產。彭端淑一貫的思想，也是他詩歌創作的重要內容。「老人無別思，日夕望年豐」（《喜雨枕上口占》），是他一生的願望。乾隆十九年（一七五四）二月，彭端淑接旨外放，四月離京，由運河乘舟南下，赴任廣東肇羅。舟過蘇北，他把自己所見的情景寫入詩中，真實地反映了運河兩岸人民的貧困與苦難：「晨起逗風行，日夕宿荒墅。烟火數家連，兼葭蔽洲渚。兒童漸殊音，風光入南土。側聞寇盜多，此鄉實貧窶。囊空無一物，所憂是羈旅。一夜不得眠，月上發柔艣。」

（《宿荒野》）「兩岸夾居民，烟火亦云盛。粟米貴如珠，頻年遭水浸。男婦多鳩形，魚蝦實為命。」（《夏鎮》）造成苦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之一，就是詩人描寫的水旱蟲蝗之災：「苦旱幾經旬，況復當仲夏。造化鼓洪鑪，山林色如赭。」「陰陽一錯亂，寒暄失其序。今秋月既望，炎蒸復如許。憂旱幾經旬，農夫心獨苦。」（《七月十六日》）「見說原田外，青苗一半消。農夫方望歲，船市已成謠。霖雨陰全盛，微陽氣不驕。祇今三夏暮，天意詎能料。」（《連雨》）「四野慶有幸，刈稻今方始。常恐十月霖，禾頭漸生耳。天道遠難窺，老夫心同杞。」（《苦雨》）「陰盛三農歉，螟生萬戶哀。那堪大旱後，是物尚為災！」（《雨不絕》）然而，他也清楚地知道，給人民造成苦難的原因，歸根結底，是人禍，是官吏、地主無止境的盤剝和壓迫。但在那文網嚴密、動輒得咎的時代，詩人對此卻不敢直陳，祇好借懷古詩來表達自己心中的憤怒。他在《臨潼懷古》一詩中寫道：「梨園子弟寒烟漫，秦墓荒涼草棘生。惟有新豐鷄犬在，逢人先問櫟陽城。」在臨潼，劉邦尚有人問起，秦始皇殘暴無道，已被人民唾棄，湮沒於荒烟漫草之中。詩人正是通過痛斥秦始皇，譴責了清朝統治者給人民帶來的苦難，從而揭示了人民苦難的根源。

在康熙、乾隆時期，清政府為了平定大小金川，進行了三、四十年的征服戰爭。乾隆十二年（一七四七）莎羅奔發動叛亂，清朝派兵進剿，叛軍增壘設險，倚碉堅守。其後戰爭時斷時續，達幾十年之久。直至乾隆四十一年（一七七六）春，清軍包圍刮耳崖，莎羅奔出降，大小金川始平。這一平叛之戰爭，對於中國建立統一的國家是必要的，因而受到詩人的擁護。早在乾隆十四年（一七四九）正

月經略傳恆初平金川時，彭端淑就寫詩贊頌：「往者邊未寧，田蕪少種粟。堂堂傳相公，談笑靖巴蜀。南人不復反，峨眉仰高躅。即今師已還，部伍一何肅。豈惟解羈愁，應慶蒼生福。從此靖烽烟，四野安樵牧。」乾隆二十三年（一七五八）莎羅奔復行叛亂，清政府派兵鎮壓，戰爭持續近二十年，至乾隆四十一年（一七七六）始平定大小金川。消息傳到成都，詩人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，又寫詩歌頌：「小醜無端起釁讎，師糧時厯聖躬憂。而以堅礪憑地利，豈知妙算在人謀。貔貅百萬爭圍窟，狐兔千群胥離羣。最喜獻俘邊靖後，蒼生無事稻盈囷。」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平叛清軍官兵由金川抵達成都，四川總督文綬、布政使錢鎰在成都舉行慶功宴會，時任錦江書院院長的彭端淑出席宴會，作《凱歌》詩。其後，又作《春興》詩，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反對叛亂、主張統一的政治態度。彭端淑不僅擁護清政府平定大小金川叛亂，對於朝廷出兵西北，平定準噶爾叛亂和回部叛亂，統一天山南北，也持贊賞態度。如他的《季冬偶題》詩，就以「田家共慶豐年兆，邊土無憂瘴氣泯。聞道捷書連日至，立看平虜靜烟塵」的詩句，顯示了他渴望「邊土無憂」、國泰年豐的心願。描寫清新、秀麗，令人神往的巴山蜀水，歌頌雄偉、壯麗的祖國河山，也是彭端淑詩歌的重要內容之一。

彭端淑的家鄉在四川省丹稜縣西三十里之桑黃埧，他的青少年時期都是在這裏度過的。尤其是桑黃埧西北數里之萃龍山紫雲寺，彭端淑讀書其上五、六年，對此懷有深厚之情。他在《萃龍山記》一文中描寫了萃龍山之形勢：「丹之山自瓦屋而來，表延數百里為總岡，或曰總諸山之岡也。自總岡而來，

表延數百里為盤陀，盤陀之山峰多而秀，石大而奇，蓋丹山之勝於是始。其自盤陀折而東也，則接赤崖、龍鵠，飄然諸山以達於眉。而其支分而南也，則蜿蜒扶輿，至萃龍山而勢一聚，其山巋然特峙，其旁兩峰橫插。每於晴日登之，萬山環拱，殊極壯觀，瓦屋、峨眉，俱隱隱如伏。」詩人在《憶紫雲樓》一詩中寫了他們弟兄在此讀書之情形：「昔年講業地，昆季常相依。風雨連牀夕，每憶坡翁詞。梵宇倚霞壁，樓高凌翠微。開窗眺遠景，萬象歸襟期。」萃龍山的景色是美麗的，詩人多年仍不能忘懷：「白雲掛石巖，閒花媚幽谷。晴雨山色分，時節鳥聲告。樓頭接大荒，萬象俯在足。南眺小峨眉，西眺小瓦屋。」去二十年，微官空鹿鹿。人生貴適意，胡為久羈束。他日復歸來，高歌抱吾獨。」（《憶山居》）「梵宮高插北山頭，四十年前此舊游。擬結茅廬空有約，夢中時到紫雲樓。」（《憶紫雲樓舊居》）「峨眉山，乃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在丹稜縣東南八九十里。其山拔地而起，聳入雲霄，高達三千多公尺。平日山頂雲霧繚繞，難見真面目。若紅日朗照，萬里無雲，登萃龍山東望，峨眉山山巒蒼翠，秀拔東南，景殊壯觀。彭端淑的幾首《望峨》詩便是在丹稜寫的。詩篇描寫了峨眉山壯麗之景色，表達了作者嚮往之情：「峨眉峻極壯巴川，雨後相看似目前。半隔西南遮大霧，全低丘垤逼遙天。千年積雪浸人骨，五夜流光綴佛筵。自嘆此身多俗累，擬將登眺恨無緣。」在丹稜縣東之夾江縣城西還有一座千佛巖，在彭端淑之詩裏也有描寫。然而詩人更為讚賞的是樂山舉世聞名之大佛。他寫了《過大佛巖》詩，詩前有小序：「刻山為佛，高百丈。聞唐宋上有樓閣，今亡矣。」詩云：「百丈凌雲上，三江匯足流。波濤長在眼，風雨幾經秋。曲徑迷行迹，蒼苔點客舟。舟行倏已遠，回首失嘉州。」（《公集》）